

初唐佛教的平民化

——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

张子开

[摘要]从李治和武则天伊始,唐王朝专尚进士科,所试内容亦渐弃原来的试策和儒家经义,转而以诗赋为主。初唐中后期新出现的这一国家用人政策,导致了唐朝主流文化的大转变;流风所煽,中国佛教亦从士族宗教而转变为平民信仰,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就此拉开帷幕。

[关键词]中国佛教;唐朝;士族宗教;平民信仰;科举政策

中图分类号:B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3—0051—03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培育项目“善慧大士语录校注”(SKJ201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子开(1964—),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佛教文献。四川成都 610064

初唐中后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魏晋以来的以士族为中心、贵族化或玄学化色彩浓厚的士族宗教,转而趋向于以中下层阶层为主流的平民化信仰。而这种转化的主要动力,正是当时国家科举政策的改变。

据说出自汉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①,但实际上从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的隋朝皇室^②,世为显赫贵族。至杨广以府兵集中的关中地区为基地,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此后,北定突厥,南灭陈朝,统一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即陷入分裂长达近三百年的华夏南北。隋北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沉重打击了江南士族高门;彻底废除了汉以来的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但关陇军事贵族仍为隋朝统治核心,门荫出身的门阀世袭制仍为主流,一般人士则主要通过吏职和军功入仕。

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李渊逼隋恭帝让位,建立唐朝。李渊仍然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统一了全国^{[1][P.212]}。李唐王朝一开始因循的是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人才来自宇文泰所创建的胡汉关陇集团和北朝传统山东士族,士族家世相传的学业对当时政治、社会有着极重要的影响^[2]。当然,也继续着隋朝以来新兴的科举取士制度,包括随时设科的制举和定期的常举。但此时凭门荫和“流外”入流而入仕者却远多于科举出身者。高宗李治、武则天伊始,专尚进士科;玄宗朝,原为常举

一部分的进士科一跃而为科举重心,进士科所试内容由原来的试策和经义变为以诗赋为主,“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3]。

当然,科举与门荫之间的矛盾一直长时期存在着,甚至到了中晚唐之际的文宗朝(827—840),还有人提议罢除科举。《新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三十四·选举志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4]

可见,士族所恶者,不过为进士科而已,并非一例排斥科举,因选举制度中的明经科实延续了

士族家学也“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3] [P. 272]} 唐代士大夫中的最大两个党派牛党、李党,就是因科举或门荫、进士或明经这两类不同的用人制度而形成的^{[3] [P. 258-272]}。“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变也。”^{[3] [P. 268-269]}“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3] [P. 276]}。

其实,始自高宗朝的用人政策的改变,其影响远超出科举本身,导致了唐朝主流文化的大转变。其一,教育、选举、学术乃至仕宦阶层,由偏重儒家经学转向重视文章词彩。“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3] [P. 259]}“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3] [P. 261]}其二,流风所扇,社会其他领域的主流文化,亦由士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唐》,引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之言曰: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寢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韞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歃,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相谈訾,无所不至焉。^{[5] [P. 357-358]}

陈寅恪评论道“据此,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3] [P. 205-206]}

因高宗、武后伊始,进士科最为尊崇,原出北朝以来山东士族旧家,甚至李唐皇室所属的关陇集团之势力日微,而由进士出身、为君主所提拔起来的新兴中下层知识分子却渐居社会中坚。“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3] [P. 268]}这样,在朝廷有意打压士族的种种政策之下,在旧士族所据占的社会关键位置日渐被多来自庶族的进士科获胜者所取代的同时,反映社会中下层愿望的平民文化逐渐占优势^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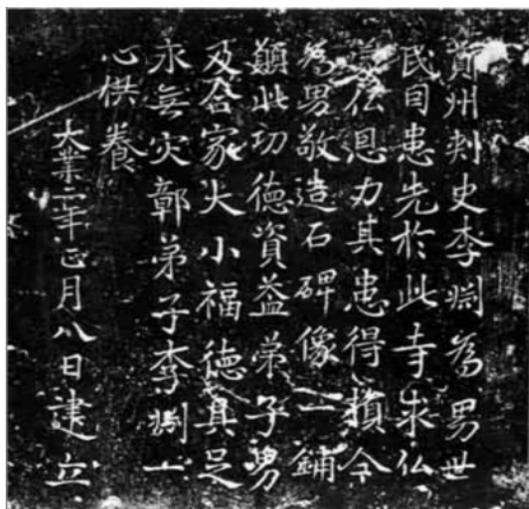
二

源于科举政策的改变所道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文化诸领域的变化,自然亦延及宗教信仰。原先主要反映士族阶层观念和情趣的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内中的平民因素愈来愈多,而原本被压抑的民间信仰迅速发展,部分民间信仰甚至进入了主流宗教的行列:平民信仰在初唐中后期一跃而在宗教信仰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

倘以佛教而言,李唐王朝本奉道教为国教^④,然诸帝亦兼信佛教等。如高祖李渊尝因其子李世民,至佛寺祈祷;病愈后,复为寺造弥勒像一铺以感恩。此像之造像记曰: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
 仙,蒙仙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
 铺,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
 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大业二年正月八日建立



此记或称“李渊为子世民祈去疾造像记”^⑤等。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一“隋李渊为子世民祈疾记”条“此唐高祖也记。……按,是时太宗才九岁耳。而史称高祖为雒阳岐三州刺史,不曰郑州,此亦可以证史之阙。”^[6]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记》卷二“李渊为子祈疾疏,行书,大业二年正月。今在鄆县草堂寺。”^⑥清林侗

(1627~1714)《来斋金石刻考畧》卷中(唐)高祖为太宗祈疾疏”条“此隋大业二年正月八日刻也。高祖此时尚为郑州刺史,太宗方九岁。……石方广尺许,在鄠县草堂寺。非原石,乃元寺僧重刻,未佳。”则是事发生在李渊任郑州刺史、李世民方九岁之大业二年(606)也。

至武则天时代,武氏不但自己酷信佛教^⑦,而且于永昌元年(689)^⑧让白马寺主薛怀义、僧法明等上所著《大云经》,暗示将有弥勒转世的女王出现^⑨,借之于载初二年(690)九月改国号曰周,自登帝位,而且将《大云经》颁发于全国寺院^⑩;天授二年(691)四月,更升释教于道教之上^⑪。因武氏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⑫,故而今广元一带尚留存著部分有关武则天的佛教文物,如唐代武后真容石刻像,这尊像表现的是老年时期的武则天形象,结跏趺坐,状如弥勒菩萨^⑬。

广元市千佛崖的大云石洞中,亦矗立着李治、武氏并坐像及武氏立像^{[7] P. 69-80}。前,武氏化身;后左,武氏;后右,李治。

李渊因子病而祈佛保佑、病愈后复还愿,本身即有着浓郁的民间信仰色彩。爰及李治、武则天时代,更主动地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实际上反映出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和世俗化。这种世俗化和政治化再延伸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就是宗教信仰的平民化。

我们认为,隋唐五代宗教信仰的日渐远离士族为主道而趋于平民化,自是始于唐高宗李治(650-683年在位)、武则天(684-704年在位)时期,而完成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712-755)。或从佛教壁画等而观,称佛教的世俗化始于中唐^{[8] P. 113-118},无疑迟暮一些,且未能反映出整个宗教信仰的走向。

注释:

①(唐)魏征等《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暹,暹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祜,祜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關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北京:中华书局,第1册,第1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唐长孺撰“隋”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

③有关隋唐文化的演变,尚可参考: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古籍,2005年11月第1版。2、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3、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④参考:1、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第253-292页。2、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

史》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1-533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唐长孺撰“隋”条。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五“为子禱疾疏”条、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六十二《石刻文字三十八·隋》“李渊为子世民祈疾记”条,并袭之。

⑥《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六十二《石刻文字三十八·隋》“李渊为子世民祈疾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有关武则天的信仰,参考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载氏著《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134-159页。

⑧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谓,时为天授元年(690)。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4月北京第1版,第224页右栏。

⑨《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后晋]张昭远、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14册,第474页。

⑩参考:1、张子开《敦煌普贤信仰考论》,载《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69-80页。2、张子开《正史中的唐五代禅宗史料——略论社会思潮对史书编纂的影响》,“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13-18日,香港大学)。后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合刊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469-1483页。

⑪[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胡三省注:谓大云经也)升于道教之上。”[宋]司马光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第14册,第6473页。另参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第224页右栏。

⑫1954年广元县皇泽寺发现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廿二年(959年)的《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曰“父士護为都督,于是□□后焉。”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九域志》云:“利州都督武士護生武后于此,因赐石刻其真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参考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则天寿八十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⑬张子开拍摄于2006年。

参考文献:

- [1][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4][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三十四·选举志上[Z].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唐]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6]丛书集成初编(第1607册)[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张子开.敦煌普贤信仰考论[J].山东大学学报,2006(4).
-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收稿日期:2012-01-20 责任编辑 尹邦志